

專輯論文

「後疫連接」中的城市陪伴動物數位故事 講述實踐與社會交往變遷

方師師

摘要

本文通過分析中國大陸新冠疫情後期社交媒體上城市陪伴動物的數位故事講述實踐，來鏡像凝結在「後疫連接」中的社會交往變遷。作為一種誕生於極端且罕見壓力狀態下的應激性反應，「後疫連接」投射在動物數位故事講述上產生了與日常敘事不同的突破性實踐：通過共創故事、正義觀看與群體浮現，行動者重建了同地方之間的歸屬感，重構了線上講故事的客觀性標準，重組了關係資源進行和平行動。但是「後疫連接」是一種非常態下短暫且脆弱的互動，當外部壓力退去，其對市民社會中公民精神的成長作用還非常有限。

關鍵詞：後疫連接、數位故事、社會交往

方師師，上海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興趣：技術傳播、數位修辭、算法研究。電郵：fangshishi@sass.org.cn

論文投稿日期：2023年2月1日。論文接受日期：2023年8月18日。

Special Research Article

The Practice of Digital Storytelling about Urban Companion Animals and Changes in Social Interaction in Post-Pandemic Networking China

Shishi FANG

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d digital storytelling about urban companion animals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during the COVID-19 lockdown in mainland China, aiming to characterize changes in social interaction as “post-pandemic networking.” As a stress response generated under extreme and rare pressure, “post-pandemic networking” differs from the daily narrative. It seeks to rebuild the sense of belonging to a place, reconstruct the objective standard of online storytelling, and reorganize resources for peaceful actions. However,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showed that post-pandemic networking consisted of short-lived and fragile interactions under abnormal circumstances, which indicates that when external pressures are removed, the role of post-pandemic networking in promoting a civic spirit among citizens in an urban society is still limited.

Keywords: post-pandemic networking, digital storytelling, social interaction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Fang, S. (2024). The practice of digital storytelling about urban companion animals and changes in social interaction in post-pandemic networking China.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67, 63–90.

Shishi FANG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interests: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digital rhetoric, algorithm studies.

「後疫連接」中的城市陪伴動物數位故事講述實踐與社會交往變遷

引介

自2022年3月28日上海開始浦東浦西「分區封控」，到4月10日實行封控區、管控區、防範區「三區」劃分管理，再到6月1日上海市政府發布〈致全市人民的感謝信〉官宣「全面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2022），在為期兩個多月的時間裏，上海城市中大多數社區經歷了「足不出戶」、「不出社區」的封閉式管理。為了打贏這場新冠疫情的「大上海保衛戰」，在滬的二千多萬人口被迫突然「靜了下來」，停止所有的外出活動，居家或在指定地點隔離。

自上而下的新冠防疫政策試圖通過阻斷病毒傳播的接觸面來切斷傳染鏈條，純粹的物理和物質上的隔斷導致了社會面上的緊急斷連：這其中包括將個體按照密接（指與疑似或確診病例症狀出現前兩天開始，有近距離接觸但未採取有效防護的人員）或次密接（指與密接人員有過間接接觸的人員）關係屬性進行不同程度的隔離，對可能感染但尚未確診的人群施行「應收盡收」政策，最大程度截斷傳染鏈條；禁止或停運非官方指定的快遞和外賣，對已經出現確診病例的社區、樓層等實行物理性質的圍欄、鐵門隔斷；將整個城市按照行政區和街道單位分別劃開管理。後期疫情嚴重時，極端情況下還出現了將獨居老人與保姆、母親同嬰兒、主人與陪伴動物等相互隔離的情況。

出於官方要求，上海此次的新冠疫情「保衛戰」期間，媒體等機構發布消息號召民眾不要囤積物資，但之後物資短缺造成了集體大恐慌；疫情封控管理的制度與規則邊界模糊，時間表不明，出現問題無處尋求解決；面對民眾普遍關心的問題，從社區到街道再到行政區，均呈現「治理失靈」的狀態。在這樣一種「速凍模式」的突發封禁狀態下，身處上海的普通市民被迫處於一種「應激狀態」中：既要與現實中個體既有的線下關係突然隔斷，同時又需要與平時較為陌生的街道/社區管理部門、核酸採樣部門、「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社鄰形成「臨時線上一線下共同體」。這構成了我們的「後疫連接」（post-pandemic networking）：出於突發性的防疫政策要求，個體被迫同時處於強制性的「外部斷連」和「封閉連接」中。

這樣一種突發狀態形成了一個新的「社會實驗室」空間，製造了一種罕見的危機時刻，每個身處其中的個體都在經歷「壓力測試」。由於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7期(2024)

是被迫突然遭遇封禁，這種強制性的「在一起」又製造出了新的連接可能——日常生活中不認識、不連接的關係進入了「連接視窗」，由此帶來了新的問題和矛盾：如何看待這樣一種外界強制性壓力驅使下的強迫聚集，在上海這樣一個人口多、流量大、功能密的超大「複雜巨系統」(上海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2021)中，個體如何應對緊急、處理矛盾、謀求生存？

我們試圖通過新冠疫情中陪伴動物的數位故事講述實踐來鏡像這一「應激性連接」：即通過一系列主體身分在極端狀態下如何被認知、建構和承認的過程，反觀「後疫連接」中的社會交往變遷(Kennedy et al., 2016)。之所以選取陪伴動物作為考察對象，乃是由於關於陪伴動物的爭議「介入」(Nah et al., 2022)到了強制性的斷連與連接中。在極端封閉狀態下，日常變得「異常」，正常變得反常，原有的公私邊界被強制打破，新製造出的互動空間可以窺見隱匿在日常生活背後的社會心靈：動物作為人類社會中的「他者」，可以是人的延伸，人也可以為動物「代言」(Maddox, 2020)。在一般情況下，陪伴動物與「野生動物」和「邊緣動物」有別(唐納森、金里卡，2022：204–207、301–313)，更能體現出人類對待族群中「弱小者」的態度。在極端壓力情況下，陪伴動物是否僅被認為是一種「會動的物」，不同群體的態度也可用來理解社會對待老弱病幼以及邊緣群體的觀念。「擁有權力資源的一方總是傾向於將他者邊緣化，因此動物的命運和弱勢族裔及女性，確實有許多相似之處」(黃宗潔，2022：9)。

本文並不試圖就人與動物間的哲學和倫理關係作過多闡釋，而是希望通過觀察陪伴動物的數位故事來「鏡像」突發斷連城市中不同階層間的交往溝通「邊界」。這種邊界在日常情況下通常作為一種「隱性知識」存在於人與人的默契之中。但在極端反常情況下，最具爭議性的話題會標識出這種隱性的默契間模糊的邊界，「劃界」在熱議時刻顯形。

近年來，中國大陸官方媒體上關於弱勢群體、邊緣群體的新聞報導，數量和品質呈現下滑。但在社交媒體上，與之相關的討論與爭議卻大量存在且層出不窮(李艷紅，2016)。這些話題在官方話語中幾乎都被壓制，官方通報也遭到強烈的社會質疑，社會連接撕裂。我們討論的要點在於，特定條件下的數位故事講述實踐是否會是一種更加有機

「後疫連接」中的城市陪伴動物數位故事講述實踐與社會交往變遷

的社會連接？這種連接具有哪些行動策略，又具有哪些潛力？這種經由數位故事講述實踐形成的連接行動是否會催生出新的階層或力量？

理論與視角

查理斯·蒂利 (Charles Tilly) (2020) 認為，社會生活可以分為慣例、準則、技術性說明和故事四種理由：其中慣例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慣常性理由；準則即現行的規則如法律、規章、宗教戒律等；技術性說明是基於科學的邏輯給出的機制性解釋；而故事則是一種解釋性敘事，尤其是在道德判斷方面。人類創造了故事不僅用來娛樂，還用來指導生活。故事「為令人困惑、出乎意料、富有戲劇性、成問題或具有典範意義的事件提供了簡化版的原因－結果說明」(蒂利，2020：71)。

那麼社交媒體上的數位內容是「故事」麼？一般觀點認為，相比傳統的印刷媒體、廣播電視，社交媒體上的內容是碎片化、非時間序列的，甚至是一種穿插交錯、平行交錯的無時間的時間(謝靜，2016)。但比如 Page (2013) 通過對社交網路媒體(如 YouTube)、微博客(如 Twitter) 和網路百科(如 Wikipedia) 上故事的敘事策略進行的研究發現，社交媒體上的故事敘事不僅包含傳統印刷、電視媒介中的要素，如部分－整體分割(part-whole segmentation)、順序組裝(sequenced installments)等，同時還具有非目的論敘事(non-teleological storytelling)、倒序歸檔(reverse-order archiving)、順序刪除(sequenced deletion)等特徵。由此她認為，社交媒體上的數位敘事是一種具有「相對連續性」(relative seriality) 的故事：比如可以將碎片化敘事視為是一種「最小連續」的片段單元，微博客上的即時發帖同樣也遵循時間順序性，以及多人的線上書寫具有分散式連續性等 (Page, 2013, p. 49)。

因此，當我們選擇對社交媒體上的數位故事進行分析時，需要重點關注兩個方面的問題：第一，敘事過程和內容生產之間存在重要關係，即需要考慮敘述者和觀眾的雙向視角；第二，社交媒體內容生產的「相對連續性」突出了進行敘事批評時語境化方法(contextualized approach) 的必要性，即故事坐落的社會－歷史境況。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7期(2024)

已有對敘事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作為形式系統的敘事、作為修辭的敘事，以及作為意識形態工具的敘事(斯科爾斯、費倫、凱洛格，2015)。其中，作為形式系統的敘事主要依照某種語法模式，採用經典敘事的結構主義視角，來處理「意義的創造是有章可循的活動」這個問題。通過挖掘語料庫中的共性元素，以不同的方式選擇原則(縱聚合)和排列原則(橫組合)來分析和區分(Ferree et al., 2002)。作為修辭的敘事關注「修辭三角」——作者、文本和讀者在敘事意義生成過程中的作用，但較少關注恆定不變的規章制度和先驗的政治信仰。而作為意識形態工具的敘事則強調敘事的政治性，同時這樣的「政治介入」也提供了一種審視對象的濾鏡。這種視角在後期與作為形式系統的敘事產生了交匯，通過閱讀、闡釋和批評，在文本細節和巨集觀文化準則之間建立起了聯繫。比如「故事社會學」(Plummer, 2002)就從更為宏觀的層面上關注制度對故事話語的形塑，並著重考慮四組重要的研究問題：第一，故事的性質與講述策略；第二，故事生產－消費的社會過程與結構；第三，故事所扮演的社會角色與效應；第四，故事所涉及的社會變遷、歷史與文化因素。這一框架致力於檢視某些新出現的敘述性質和它們所產生的特定社會歷史條件，用來發展一種批判的人文主義方法與理論，以促進更好的複數的社會世界(social worlds)的生成(Plummer, 2016)。

本文在思路層面上希望識別出數位故事所扮演的社會－政治角色，追溯它們被建構和消費的過程，以及是否會潛在地影響公共生活轉型。具體而言，本文選擇的新冠疫情期間陪伴動物的數位故事，是一種「準則質詢類」故事。作為一種通俗的因果，它有相對明確的目標，也有自身的邏輯和技巧，它公開地對非常時期社會準則的缺失問題進行了質詢，它的邏輯可能比較簡單，也會受情感驅動。它的價值在於，當專業的技术說明和日常慣例在非常時期失靈時，當某種依賴強大權力不需要過程合法也不給予因果解釋時，「通俗的因果」故事承擔了社會生活中的思考與希望。

本文在操作層面上綜合了敘事研究的三條路徑：出於對「故事穩定性」的探求，分析從形式系統敘事的結構主義脈絡出發；如同修辭敘事中強調「讀者關注」與作者和文本之間建立的「懸念」、「好奇」與「驚訝」

「後疫連接」中的城市陪伴動物數位故事講述實踐與社會交往變遷

關係 (Sternberg, 2001)，認知敘事學視角將經典敘事結構的核心問題推進至強調「闡釋者在其中建構的世界」；通過對框架和腳本的識別、區別與聯繫，本文嘗試追溯某一形象的社會建構過程。由此我們提出了本文內容分析的四個維度：

第一，甚麼樣的思維工具、進程以及活動使我們有可能去建構和理解數位故事敘事？

第二，如何分析宏觀設計和微觀設計，以及基於接受者的闡釋觀察？

第三，如何識別出數位故事的框架(邊界與容量)和腳本(反覆出現的模式與序列)？

第四，數位故事如何同傳播機制相結合進行日常線上敘事？

這樣的出發點和視角為研究製造了一個創新契機：即在進行社交媒體內容敘事分析時，兼具產－消雙向互動並關注故事的歷史－社會語境。這幫助打通了本文所要關注的重點：故事在社會和政治中的角色，它們建構和消費的社會過程，以及故事實踐所要面臨的政治變遷。(黃盈盈，2018：23)

方法與樣本

在新冠疫情爆發的初期，Yin等人(2020)曾分析了新浪微博上1,160條關於城市陪伴動物的公共輿論主題，認為這些爭議反映出城市空間中人與多物種共處的政治、經濟和情感鬥爭，尤其是多物種家庭在生存倫理、寵物產業以及城市公共空間中的爭議。但該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資料搜集覆蓋時間短，只有一個月左右；微博上的資料很難反映不同城市、社區和街道的具體情況；社交媒體上的資料代表性有限，並且主流媒體、意見領袖會引導和操縱公眾意見。

本文選擇基於文本細讀的內容分析法和案例研究來深入理解與考察該主題。內容分析法是非反應的、允許接近那些難以接近的研究對象，還可以進行歷時性的縱向研究。逐字閱讀和解釋的內容分析法，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7期(2024)

通過考察個人日常的口語和寫作，來了解研究對象對自身的敘述，以及對所發生的事件中他人或其他力量的解釋性歸因(里夫等，2010)。本文首先將日常條件下關於陪伴動物的數位故事實踐視為一個整體，通過資料文本細讀發現其日常敘事框架。這樣所進行的「潛在內容分析」，即作為具有一定洞察力的闡釋者，經由「處理對內容及其上下文的判斷、評估和解釋……把合適的語境或背景及其社會功能，作為一個整體引入到了傳播中」(里夫等，2010：173)。然後通過解讀「後疫連接」中的三個典型故事，比對發現非常時期經由數位故事講述所進行的突破性實踐。該研究的假定是，傳播最重要的特徵可能不是通過抽樣捕捉到的，相反，內容的意義是由有洞察力的研究者闡明的，而這種研究得出的觀察和結論普通人也能感知到。

本研究的樣本構成主要有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個創立於2018年的微信公眾號「把話筒遞給貓」(ID：Home_1ren1mao)。該公眾號IP屬地為上海，自我簡介是「用99個真實的貓故事，治癒一顆人類的心」。自創辦以來，該公眾號持續關注和發布和城市寵物救助、領養相關的話題，截至2022年6月14日累積發布內容663條。該公眾號的主理人「貓咪李察德」自稱是一名「貓咪記者」，在每篇推送的末尾，她都會公布自己的微信號和聯繫方式，歡迎受眾「內容投稿|內容合作|找我嘮嗑」；她也會實地奔赴線下進行採訪拍攝報導。該公眾號自創辦以來，除領養之外沒有發布和寵物經濟(食品藥品醫療保健)、寵物娛樂(趣圖搞笑視頻)等相關的內容；在推送的內容中，主理人會強調自己對信息源真實性、資訊真實度的核查。該帳號的更新具有長期性、連續性以及公民參與報導的特徵，帳號主理人對自身的定位也具有一定的社會責任感和自我效能感。在上海抗疫封控期間，該公眾號除保持一貫的內容發布外，還原創發布了某社區網紅貓被業主虐殺的內容。本文選擇對這一公眾號自2018年創辦以來設立的專欄「99個真實的貓故事」作內容分析(已有原創故事70個，時長覆蓋約三年時間，由2018年10月18日開始，截至2021年10月17日)，通過這種方式建立起數位元故事社會學的連續性分析框架；同時，該公眾號於2022年5月23日發布的〈難以相信！男子在家藏人一月逃避核酸，還當眾打死網紅貓〉系列文章也是本文的案例研究對象。

「後疫連接」中的城市陪伴動物數位故事講述實踐與社會交往變遷

第二個部分的樣本內容主要由三個案例構成，選擇主要基於以下三個理由：第一，該三個案例均處於中國大陸新冠疫情後期，相比疫情初、中期各地對待陪伴動物的政策缺失、出台遲緩或尚且寬鬆，三個案例均體現出一定程度的變化；第二，三個案例均突破了陪伴動物的日常敘事框架，是一種「準則質詢類」的故事，但各有偏重；第三，三個案例在大陸社交媒體上均引發了較大的關注。本研究所採用的資料均來自作者於2022年1月至6月期間在微信平台、新浪微博、抖音平台、大陸各大新聞網站上搜集整理的文字（約13萬字）、圖片（72張，包括截圖）和視頻資料（19條，不含重複或剪輯），基本窮盡了大陸互聯網上截止到2022年6月可以搜集到的所有數位敘事內容。

但需要言明的是，這樣的樣本和資料本身存在局限性和不足。根據上海市委網信辦相關系列交流報告，大陸社交媒體上對內容的管理規定使得從外部較難確切獲得線上事件傳播的基準資料（ground-truth data）。而基於字詞聯結式的文本細讀（魏艷輝，2022）內容分析方法對潛在內容意義的挖掘存在一定主觀性。但我們認為通過充分且細緻的解讀可以完成本文的既定研究目標，雖然無法給出一個絕對客觀的「解釋」，但是「身臨其境」和「身為貓奴」的雙重語境可以提供一種貼近的理解。如同陳思和（2004：109-116）認為，文本細讀有「直面作品、尋找經典（引用化用）、發現隙縫、尋找原型」四種方法，需要閱讀者「歡悅地、投入地、感性地閱讀，並保持主體性的參與」。

陪伴動物的數位故事日常敘事： 框架、腳本、文本與網路

敘事框架：喜劇底色上的複雜

在認知敘事中，框架是指「主體對總體經驗區域所持有的認識」（van Krieken & Sanders, 2021, p. 1407）。框架提供慣常、默認的知識，故事敘事可以符合也可以背離標準模式，去啟動這種知識並使之複雜化。在本次研究選擇的70個陪伴動物的真實故事中，關於動物的事件性質總體可以分為人寵關係（24）、領養救助（17）、社會支持（12）、休閒娛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7期(2024)

樂(7)、犯罪虐待(7)、緊急事件(3)六大類。每個故事均有明確的敘述主角，人和動物被劃分在二元對話的兩極。由於該欄目定位「真實故事」，在故事的可述性(tellability)上儘量以「非人格化敘述」來進行，同樣也有「同故事敘述」，即採用第一人稱進行的敘述。雖然這些故事的事件性質分布較為分散，並且可以理解為這些故事主題是被作者挑選出來的，但依然可以發現在選擇邊界時「評價點」(point)對故事的影響：即這些故事在敘述時希望通過某一成形的知識框架引發讀者對故事的「即刻行動」(Fludernik, 2002, p. 42)。而這個聚焦框架(focalization)先驗設定了主角動物的身分(老、弱、孕、幼、殘疾等)和特徵(可愛、活潑、好動、膽小、溫柔、個性等)，並將其之後的經歷作為主角能夠參與、體驗、改變和決定的「涉身經歷」(experience of embodiedness) (Herman, 2004, p. 303–310)。阿甘本(Giorgio Agamben) (2018)在對古希臘悲劇和喜劇的研究中認為，如果一個角色出場的性格是設定的，那麼後面無論發生甚麼，都是喜劇(比如小丑活動)；而如果角色的性格最初並不明確，需要通過一系列的行動最終成就(比如英雄歸來)，那麼這就是悲劇。如果以此來評判，幾乎所有陪伴動物的數位故事都是在一開始就設定了主角動物的性格，後面無論發生甚麼事情，都是一出「喜劇」。有研究認為人們的線上負面內容分享存在一種「痛苦的歡愉」(Hornik et al., 2019)，從敘事框架的角度來看，與一般「不敢看」、「太虐心」的感受不同，關於陪伴動物的「故事穩定性」是設定在具有複雜變化的喜劇底色上的。

腳本經驗：體驗性的具身傳達

雖然陪伴動物數位故事的主導敘事框架是一種「複雜性的喜劇」，但這並不意味著在閱讀文本時所有的體驗都是開心樂觀的。相反，很多故事讀起來非常「痛苦」。這提示了關於陪伴動物數字敘事的腳本經驗。「腳本」是指對框架區域中的事情之普遍情境和序列所持有的認識。如果我們對這些數位故事所處的時空、身分、關係進行分析，可以看到，時間性(很少能看到具體時間，代之以剛出生、奶貓、剛絕育

「後疫連接」中的城市陪伴動物數位故事講述實踐與社會交往變遷

等模糊說法)、身分狀態(流浪、放生、群養、聘貓等)、空間權利(家裏、社區、辦公室、鄰里、跨城、跨省等)以及緊張與不穩定因素(待領養、棄養、難產、癱瘓、生病、車禍等)是反覆出現且不斷強化的情景,而這些腳本的出現,在時空序列中具有一致性。這些腳本通過引發讀者的「體驗性」將感官身體上的感受和狀態以具身經驗的方式傳達出來,引發情緒震動或現實行動。

文本自然：擬人化的輸出固化

通過框架和腳本建立起的知識喚醒具身體驗,並在反覆經歷和不斷驗證後固定下來,這種反覆的策略以「擬人化」的形式輸出。我們在對陪伴動物數位故事的「人物區」分析中發現,雖然動物和人處於對話的兩極,但基本上都是動物講著人類的話語,「人為動物代言」。動物被闡釋為在進行人類角色扮演,比如「看家」、「守衛」、「諧星」;動物的行為被解釋為可被人類理解的行為,比如「開門」、「彈鋼琴」、「碰瓷」;動物也帶上了人類的情緒,會呈現出「抑鬱」、「暴躁」、「懂事」的狀態;動物還會成為人類社會的「他者」,可以是「親人」、「天使」或者「愛情」。這種將某種固有的思維模式輸出並固定下來的方式,完成了從接收方重建自身外部自然的過程。當人類看向動物的時候,它不再僅是動物本身,而是以一種人類熟悉的形式被「映射」進來。動物身處人類社會但外在於人類生活,被納入經驗範疇中輸出固化為人類的「文本自然」。

契合網路：數位傳播的「註釋」功能

這70個故事彼此之間在排序上沒有固定的序列,每個故事都可單獨存在。這些故事體現出社交媒體網路上內容生產的特性:相互模仿、任意連接、去語境化、非序列、非進化、逃逸與解域(謝靜, 2016)。這些故事也可看作是某種程度上的「同義反覆」,它們不致力於提供更多的資訊或解釋,訴諸的是一種氛圍營造。在這個敘述過程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7期(2024)

中，前後來回的反覆跳躍使得故事意義的生成處於折迭狀態：模糊的時間性 (fuzzy temporality) 指向社交媒體資訊流的「無主之地」：無方向、綿延性、生成性。但這些故事會在某個「視窗機會」突然以回應節點主體的形式適時 (right-time) 呈現，其意義有待於接收主體自行去理解。這是類似一種「註釋」形式的敘述功能，它有自身的內容，但不具有獨立的意義。

表一 數位故事的日常敘事內容分析

		進程活動	思維工具
宏觀設計	時間分布	剛出生、奶貓、貓媽、剛絕育、懷孕	可敘性 評點性
	空間權利	家裏、社區、辦公室、鄰里、跨城、跨省	
	事件框架	人寵關係、社會支援、休閒娛樂、犯罪虐待、緊急事件	
微觀設計	先驗特徵	老、好動、膽小、暴躁、溫柔、個性、殘疾	具身傳達 文本自然
	所處狀態	流浪、放養、群養	
	身分轉變	待領養、難產、癱瘓、生病、車禍	
	行動方式	投喂、領養、絕育、棄養、安置、聘貓	
闡釋觀察	腳本	看家、守衛、顏值、彈鋼琴、拯救電影院、開門、擱毛、諧星、逆襲、生病、離開、懂事	擬人性 註釋功能
	角色	親人、天使、愛情	
	對話	警覺、碰瓷、離不開、送走、抑鬱、放棄	

通過以上關於城市陪伴動物的數位故事內容分析，我們發現從認知視角建構起來的日常敘述中，「帶有複雜變化的喜劇底色」是其主導敘事框架；對事物的具身經驗、感官體驗以及相似的行動腳本構成了敘事模式；而通過對敘事模式的反覆輸出和「自然化」，數位元故事文本最終被確定下來，陪伴動物的形象被建構起來。這三種敘事過程彼此組合，並與社交媒體的網路屬性與展覽機制配合，由此形成了陪伴動物數位故事的日常框架。這一分析有助於我們了解在日常狀態下，人對於陪伴動物的態度、觀感與意向。

但這種較為穩定的數位故事議程在後疫情時期的極端壓力狀態下遭遇挑戰，突出表現為通過線上內容生產而進行的在地關係重塑、機器與人協作形成的「見證式」觀看，以及特定群體通過爭取注意力資源所進行的線上和平行動。這些動態的實踐既是對日常框架的補充，也展現

「後疫連接」中的城市陪伴動物數位故事講述實踐與社會交往變遷

出在非常時期，經由陪伴動物的數位故事生產，社會交往變得更为複雜且多層次。陪伴動物的數位故事不再只是一個小圈子裏的歲月靜好，它變成了一種社會「邊界物」(Haim & Zamith, 2019, p. 82)，連接、重建和修改了交往規則，並承載了對基本權利、公私邊界的社會關切。

「後疫連接」中的陪伴動物： 重建地方、重構標準與重組關係

線上「造鄉」：數位故事共創中的關係重建

數位故事與線下地方之間的關聯常被忽視但又非常重要。數位元媒介的「移動性」能夠激發和促進線上公共參與的積極性，但可移動的數位元媒介也會消弭「地方性」，比如鄰里關係與社區環境 (Shah et al., 2005)。社區具有保有成員集體記憶和認同感的作用，但社區成員的認知既不相同也不一定同步 (Dahlgren, 2005)，尤其是在城市「陌生人」社交和流動鄰里之間，社區容易衰落成為一個位址，但缺乏在地聯繫 (Hickman-Dunne et al., 2022)。

對於上海這個「複雜巨系統」來說，日常緊張快速的工作節奏和複雜流動的人口屬性使社區居民之間普遍缺乏有機聯繫。之前通過傳播基礎設施理論 (communicative infrastructure theory, CIT) 模型對上海社區空間中基層官方微博的傳播效果研究顯示，社區空間營造主要通過支持本地居民虛實多重異質性敘事網路層間的融合來影響城市基層官微的傳播效果，而多元開放的社區空間對官方微博傳播幾乎不存在仲介影響 (潘霽, 2023)。但在 2022 年上海疫情封控期間，很多居民被迫封閉在有限的居住環境中，這種強制性的封閉帶來了三重直接後果：第一，平時難得碰面的居民現在必須長時間聚居在一起，客觀上增加了本地社區對群體的影響；第二，高度普及的互聯網、手機等移動通信設備，結構性地替代了電視、報紙等媒體的傳播，成為居民接收資訊和進行溝通交流最為主要的媒介；第三，封控帶來的無所事事與煩躁不安，使得居民花費大量時間關注社交媒體上的資訊，並高度活躍地進行表達性的數位元媒介參與。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7期(2024)

2022年4月6日，「#上海一主任隔離柯基被撲殺#」、「#上海浦東柯基被打死#」的話題衝上新浪微博熱搜。該內容配有現場視頻和照片：在上海浦東曹路一社區，一位柯基犬主人疑似確診為陽性病人要被拉走隔離，柯基追了出來但是上不了防疫車。車剛開走，柯基就被身穿防護服的工作人員「大白」拿鐵鍬用力拍了三下，柯基發出哀嚎，然後不動了，身旁似乎有血跡，最後疑似被用塑膠袋拎走了。該內容在當日晚間的社交媒體平台和各大網路媒體上迅速傳播，被大量轉發和熱議，但又被迅速下架和刪除。後該社區的居委會回應說，柯基被拖至路邊處理是因為這家有陽性病例，擔心寵物狗會傳染：「當時確實考慮的不是非常周全，之後會和寵物狗主人進一步溝通，會給予對方賠償」。

這則內容最初的來源並不是微博，而是微信上一個關於柯基犬愛好者的公眾號「基情四射上海科基群」，文章標題為〈上海之大，已容不下一隻小柯基？牠犯了甚麼錯，竟遭此毒手？！〉。該則內容由一條網友現場錄製的視頻和若干微信介面截圖構成，拍攝者在錄視頻時脫口而出「要把它打死，天啊！你這太殘忍了！」。該視頻錄製處離現場還有一段距離，似乎在居民樓上，但即便隔著這樣的距離依然能夠聽到鐵鍬拍擊落地的聲音。視頻背景音中似乎還可以聽到有社區居民在大喊「你在幹嘛！」、「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該內容雖然迅速就被下架和刪除，但催生了多個平台上以此內容為原本進行的再創作與評論。比如其中一幅大白處理完柯基站立的圖片被反覆重新處理，添加英文或日文文字「百犬斬的超記錄」等；比如在知乎平台「#上海浦東柯基被打死#」話題下，一則高讚的評論開頭引用了普里莫·萊維 (Primo Levi) 《這是不是個人》的內容：

誰要是內心裏還留有良心的種子，就會感覺到良心的蘇醒。在那些漫長空洞的日子裏，一個人會想起饑餓和勞動之外的事情，想起他們把我們變成了甚麼樣子，從我們這裏奪走了多少東西，讓我們過著這樣的人生。

這樣的開篇將一個動物的故事與人的生存狀態聯繫起來，提醒人們關注現有生活的合理性。在這篇的評論中，作者強調了上海某社區「又」一隻柯基被大白當眾打死，以此建立起該案例同以往事件和做法

「後疫連接」中的城市陪伴動物數位故事講述實踐與社會交往變遷

的關聯；作者對該事件提出了四點疑問和一點補充，分別涉及寵物是否會傳染新冠、如果確診新冠這種處理方式會不會造成更大污染、身穿防護服是否就可以為所欲為、上海的做法相比深圳建成了「集中隔離人員寵物託管中心」而言是否符合其「國際大都市」的身分定位，以及社區聲稱柯基是被主人丟棄的說法是否可信。評論引用了之前被刪除的微信號中的九幅視頻和對話截圖作為評論的依據，並在圖片的一些關鍵部分加紅圈標明。

上海之前針對新冠疫情的防疫模式有著自身的特徵，雖然沒有明確的定義，但這些特徵存在於一組組相關的資訊傳播與比對關係中：文明 vs 愚昧（是否允許陪伴動物跟隨主人隔離），開放 vs 封閉（關於陽性病例隔離的時長與程度問題），靈活 vs 死板（自主設置的中高風險標準），科學 vs 浮誇（民眾對醫生、科學防疫的信任度），精準 vs 粗放（「最小封控奶茶店」以最大程度不擾民為驕傲）等。這些構成了上海在新冠疫情初期對於自身治理能力和信心的尺度。但這些在疫情後期被外部壓力擊垮，上海放棄了之前的精準治理和「瓷器店裏捉老鼠」的最小損失策略，轉向符合中央要求的「封閉隔離」和「停工停產」。大量民眾在此期間的數位元媒介表達認為，他們覺得這個不是「2022年的上海」，不符合一個「國際化大都市的形象」。在這裏，一個模糊但是隱約可見的「地理身分」被重建起來。

在浦東柯基被撲殺的數位故事裏，我們看到在同一個社區或同一個城市，相互可能不認識的住戶，通過共同創作一個陪伴動物的悲傷故事，凝聚起了帶有共識的意見 (Belair-Gagnon et al., 2019)。Heck 與 Tsai (2022) 通過兩個在社區分享的治療體驗的案例，討論「共同創作數位故事」作為一種與地方連接的探索性方式，如何緩解傷痛製造「認同感」，形成記憶和歸屬感，並以一種「療癒型」實踐連接起人與地方，透過「一起創作和講述數位故事」建立起彈性的、勞動共創的場所關係。這項研究著重指出了故事與地點有著內在的聯繫。在本案例中，柯基被打死的視頻和文字雖最先是在寵物垂直類的公眾號發布，但在社交媒體上迅速「破圈」擴散。以上方評論為代表的意見，包括對新冠傳染的科學知識、新冠疫情的防護措施、疫情中的權力邊界、城市現代性與文明程度，以及對事實核實的糾錯等，在這樣的一個封控「斷連」的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7期(2024)

現實中重新集合起對科學、自由、文明、事實等觀念的認同。大量關於這個案例的衍生內容產品，其蘊含的哀悼與諷刺、反思與憤怒等情緒，表現出對上海地方治理的關注，很多人甚至是通過這樣的數位故事重新建立起對生活所在地的認知與認同，數位故事探索了地方性聯繫，「附近」成為一種地理身分。

觀看正義：「如實觀看」重構的客觀性標準

動物在社交媒體上的呈現是互聯網經濟隱蔽的流量密碼。有研究曾經通過對Instagram上23個寵物相關帳號進行的深度訪談發現：寵物代表著一種「純粹的歡愉」(pure joy)，提供了一種索引性的情緒動力；發寵物狀態實際上是博主自我呈現的一種策略，「寵物是博主的自我延伸」；社交媒體上關於寵物的內容承接了一種文化觀念，它是一種長期地將寵物「擬人化」的數字表現；寵物博主通過這種「噱頭經濟」也可以藉此形成自身的社交資本，甚至可以轉化為流量收入和品牌廣告(Maddox, 2020, p. 3343)。

但在大陸疫情封控期間，社交媒體上對寵物狀態的呈現，除了純粹愉悅、自我呈現、社交資本之外，還有著其他不同的功能與目的。在呈現方式上，語境化的文本、回溯性的時間、紀錄片式的客觀性，均體現出在特定語境和社會條件下博主對寵物呈現的「觀看正義」。這種「正義」訴諸於證明和說服，著力體現內容的事實與客觀。但這種有機器參與構建的正義性並非「冷血」，而恰恰是通過這種方式表達肉身的悲愴。寵物的可愛成為一種運動動力，相比情緒，它召喚一種切身的參與，並希望能在規則爭奪上隔空「血肉相搏」。

2022年3月4日，微博帳號「@有隻雪球」貼出連載微博，爆料廣東省惠州市惠東縣大嶺街道在住戶確診新冠隔離期間「人道毀滅」家中的薩摩耶犬。博文由話題標籤、文字、照片、監視器視頻、撥打電話截屏、微信對話截屏、視頻資料截圖、網頁超鏈、圖片註釋等構成。內容顯示，該住戶的男主人確診新冠後接到通知，他們飼養的三歲薩摩耶犬「雪球」要被「人道毀滅」。女主人要求給犬隻做PCR聚合酶鏈反應以確認是否感染，但防疫機構只是確認了薩摩耶的體重、有沒有拴

「後疫連接」中的城市陪伴動物數位故事講述實踐與社會交往變遷

住、會不會咬人等情況，並稱不知道會怎麼處置，需要等上級指示。女主人給當地多個疫情中心電話溝通，但都遭遇「踢皮球」，沒有得到明確的回覆。到了當日下午6點多，她通過安裝在自家倉庫裏七個監控裏僅剩的一個較為隱蔽未被拆除的攝像頭看到，兩名防疫人員進入家中，拿捕狗夾夾住薩摩耶並用棍棒重擊，一開始薩摩耶還在痛苦慘叫，後來就沒聲音了，監控視頻中能聽到防疫人員說「死了死了」。雖然無法馬上確認，但女主人說「我知道，狗狗已經沒了」。

該微博在新浪微博發布後引發線上熱議，但內容隨後不可見，博主帳號也被停運。有微博博主號召大家在微博發帖時要帶上話題標籤「#」，並在搜索欄一直搜「#惠州防疫人員打死狗#」這幾個字：「沒有熱搜我們就自己動手增加搜索量，自己頂熱度！」有微博將之前《中國青年報》、《中國新聞週刊》就江西上饒未同居民充分溝通就將其隔離寵物「無害化處理」的報導、央視新聞關於「#衛健委專家談如何對待隔離人員的寵物#」的報導並置列出，以聲援博主。主人平時發布寵物可愛日常的抖音帳號「@雪球是隻薩摩」也被網友挖出來，短時間引發大量關注圍觀。同時亦有網友致電向當地街道防疫中心進行抗議。

3月5日，惠東縣微博官方帳號發布大嶺街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文件〈關於網友反映涉疫犬隻遭不當處置的相關情況通報〉，承認確有此事，並提到該犬隻長期暴露在陽性環境中被感染的可能很大：「在緊急的過程中，現場工作人員對犬隻採取粗暴不當的方式，嚴重傷害了犬隻主人的感情，我們已向主人誠懇道歉」。通報還提到涉事人員已被批評教育停職處理。

Frosh (2019) 曾經分析過圖像作為社交媒體時代「目擊見證」的三種類型：眼見、親歷和圍觀。這種見證的功能與圖像發布的平台無關，而只同傳播介質 (medium) 相關。其中，「眼見」是一種時空轉換術，通過與過去影像的組合再現，圖像可以將過去轉移到當下的表達中，與現在的行為共同完成敘述，比如在過去的影像前再次合影。「親歷」是一種「肉身接近」(fresh-witnessing)，即通過置身在某個事件發生的場合，以親歷者的狀態「邀請」事件與自己一起發生，比如「免費抱抱」的行為藝術；第三種「圍觀」則是一種技術信號，它強調人與機器共同完成某個動作，然後將其固定下來形成「宣言」，比如手機接受資訊時的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7期(2024)

「已讀」標記。而在本案例中，還有一種價值層面的「正義觀看」，它在技術維度之外建構起一種圍繞可信、說服的客觀標準。

該案例之所以在當時可以引發強烈的反響，一個重要的因素在於隱蔽的攝像頭對防疫人員的消殺動物過程進行了全程記錄。這是一種基於技術的「如實觀看」，視頻的資料內容可被跨時空和跨媒介地保存和傳播，原始素材不經過人工的編輯剪裁。攝像頭和網路的存在打破了只有肉身「現場」見證才可能具有客觀性的約束，「如實見證」建立起機器的外在「自然性」。

圖一 經由「如實見證」而可被正義觀看的視頻資料



圖片來源：社交媒體視頻截圖。原視頻片段已被移除，轉發的相關截圖仍可在微博主的個人頁面上閱覽(有隻雪球，2022年3月4日)

但是，即便有「如實見證」依然無法構成一種新的觀看形式。因為攝像頭只能無差別的記錄，但無法賦予內容意義。新價值的建立必需觀看主體的參與，包括如何選取、解讀和使用見證材料。在該案例中，我們看到了博主的發帖，將攝像頭提供的資料資源與事件文字內容、「雪球」的歷史照片、社交媒體上的對話截圖等組織起來。攝像頭和網路提供了「見證」的可能性條件，而每一個瀏覽閱讀帖子內容的個體，每一次視頻點擊播放，都成為一個「證人」。

如果說之前「可愛經濟」中的動物形象觸發的是索引式的情緒傳播動力(Maddox, 2020, p. 3335)，那麼在「觀看正義」中寵物的影像資料則希望喚起行動。Kim等人(2022)的研究發現，新聞機構在新聞文章中

「後疫連接」中的城市陪伴動物數位故事講述實踐與社會交往變遷

納入公民目擊圖像的程度與其新聞的受眾參與度呈正相關。而該案例中，博主貼出了懷念雪球的黑白照片，並將消殺視頻截圖配上文字，有網友挖出了博主之前在抖音上為雪球開設的短視頻帳號，這些內容後來被國內的網路媒體、社交媒體轉載，成為連接和推動線下行動的動力。該視頻資料一度不可見，有網友自發地將其保存並在其他網盤、網路流媒體上播放，號召大家在微博上「自建熱搜」，搬運其他媒體關於類似事件的報導評論，致電街道防疫中心等，到最後大嶺街道疫情防控指揮部通過官微發布〈情況通報〉，向犬隻主人道歉，對涉事人員教育停職。雖然消殺不能挽回，但這份通報文檔代表了官方對這一「觀看正義」事實性和客觀性的承認。值得一提的是，該事件之後，雖然還有類似的消殺事件在大陸其他地方出現，但由於缺乏足夠的證據，沒有攝像頭與網路技術提供的「如實觀看」，當事人在社交媒體上的發聲沒有得到網友的大量支持，相關部門也沒有回應，最後則不了了之。

媒介「易見性」：線上和平行動的關係資源爭取

日常情況下，城市陪伴動物主要處於家庭空間中，是「現代社會中擴展的家庭結構」(Laurent-Simpson, 2021, p. 14)的重要組成。關於動物在城市生活中所處的位置，「動物地理學」試圖證明其位居一切社會網路中(Whatmore & Thorne, 1998)。如同Robbins (2007)徵引法國學者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的行動者網路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ANT)對美國中產階級「草坪文化」(lawn people)的論述：中產階級用一塊精心打理的草坪來體現身為美國公民的社群認同感，更進一步成為一種道德規範。「在草坪中每項事物都非獨立存在，人與非人行動者存在一種網路關係」(Robbins, 2007, p. 14)。

人們認為哪些動物應當屬於何處，包括如何給牠們分類、分配、界定「在」或「不在」(in or out of space)等，是一種人為想像出的「動物空間」(Philo & Wilbert, 2000)。動物的生活需要符合人們的想像與論述，這種想像傾向於無害、乾淨、與人親近(翁若婷, 2016)。自由活動的流浪動物經常被視為是「不在」人類的地方(out of place)(van Patter & Hovorka,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7期(2024)

2018)，而可被馴養的動物則是「在」我們之中(薛存鑑，2015)。但上海疫情封控期間，這樣想像的「動物空間」被打破。其實，不僅是動物空間，疫情中原有的人與人之間的間隔方式也發生了變化。Gemignani與Hernández-Albújar(2022)探討了一種出現在新冠疫情居家隔離期間市民通過在陽台拍手唱歌的形式構成的「半公共空間」：這個空間具有新自由主義的底色，通過共同行動重塑了參與者的主體性。在上海，居住社區中的「動物空間」分配爭議也促成了這樣的行動派，一個潛在的媒介「易見群體」通過和平行動徵集動員線上資源，用以幫助並形成自身的身分認同。

2022年5月23日，微信公眾號「把話筒遞給貓」發布推送〈難以相信！男子在家藏人一月逃避核酸，還當眾打死網紅貓〉，講述了上海美蘭湖社區一隻叫「雞排」的社區公養貓被社區業主用牽狗繩勒住摔打致死的事件。文章描述了網紅貓咪「雞排」生前的乖巧可愛，詳細記敘了有目擊者看到男子虐殺貓咪，但該男子否認行兇，並用別人的微信在社區群裏代自己發言，而社區居民反覆向物業調取監控錄影未果，居民求助警方不被理睬，行兇者在社區鬧事並且威脅鄰居。該話題隨後登上微博熱搜，「#網紅雞排貓被當眾摔死#」當日閱讀量431.6萬，討論量5,997。隨後這篇推文被平台刪除，主理人第二次重新發布，她貼出了微信後台內容被舉報刪除的通知，並進一步對該虐殺貓咪男子的情況進行了深入調查，如發現該其在家中還窩藏他人長期不做核酸檢測的問題，由此引發在BBS討論版、貼吧同城、網易話題、知乎話題等相關欄目中的二次熱議。雖然文章矛頭指向行兇者，但推文本身沒有對該男子的身分進行人肉搜索，也隱去了當事人的確切姓名和網上照片，僅展示了和該事件相關的事實和資訊。文章對行兇男子狡辯的內容逐條進行了反駁，對其虐貓藉口、人性之劣等進行了剖析。

類似草坪從剛被引進到確立成為一種社會系統，馴服了美國公民「該有何種的文化與公民性質」(Robbins, 2007, p. 96)，對待社區公養貓的態度也體現出在這一過程中市民階層的分化。在這篇數位故事中，我們看到疫情中城市居民在確定社區公養貓的「動物空間」時，在關注人與動物、人與人之間現代性的關係進程，傳達了一種身為城市公民

「後疫連接」中的城市陪伴動物數位故事講述實踐與社會交往變遷

所具有的文化與道德地景。在現實中該社區並非特權社區，疫情期間同樣受到物資匱乏和政策管制的限制，但網紅貓的遭遇以一種「失序介入」的狀態衝擊了城市價值觀念中一些對舒適合宜、秩序邏輯的定義，見證了相關個體、機構、官方、政府在事件處理時的失職與不作為：「只有在職責和『正常運作』大於一切的情況下，群體又把責任攤分，活生生的性命才會成為『異物』……需要逐離和排擠。『異物』的出現並不是因為人們變得鐵石心腸，而是人和人之間，人和外界之間的連接越來越薄弱」（韓麗珠，轉引自黃宗潔，2022：18-19）。

而那些有能力去培養文明化自然環境的公眾，就具體如何定位和維持動物在社區生活中的位置，以一種「和平行動」（Chiliswa, 2022, pp. 81-83, 101）的邏輯通過協助記錄和修補數位元故事的方式體現出來，一個媒介「易見性」群體也隨之浮現。在故事社會學的框架中，研究者會關注故事在「哪個時間點上可以出來，哪類出不來，和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如何（黃盈盈，2018：21）。這裏的「出來」，可以理解為是一種媒介「可見性」。在本案例中，前期公眾不斷通過對現實的數位化轉譯來提升敘事的媒介可見性，比如在參與調查質詢的過程中拍照、調取監控、保存聊天記錄、做背景調查等，並將這些資料發給公眾號積累素材。而媒介「易見性」則是公眾對自身媒介可見性約束所進行的調試。後期當微信推送被平台刪除後，公眾協助公眾號將內容進行修改補充後再發表出來，並將這一「被刪」的過程來龍去脈予以主動呈現，對相關的BBS、同城貼吧、網路媒體上的內容進行整合，提供更多的話題資料等。如果說媒介可見性更多體現為一種被動依從、合規平台的結果，那麼媒介易見性則是主動創造有利條件，嘗試將流量、注意力等轉化為行動資源，在有限條件下最大程度地爭取社會支持。

結論與討論

新冠疫情雖然在世界範圍內大流行，但不同國家、政府和社會對待、處理疫情和疫情中的社會關係的方式方法、機制體制卻非常不同（Nee & Santana, 2022）。中國大陸的抗疫模式有著特定的政治－社會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7期(2024)

背景和現實語境，本文雖然分析的對象是城市陪伴動物，但希望通過動物的生存狀態和由此引發的數位故事講述，鏡像社會群體尤其是弱勢和邊緣群體在非常時期的社會處境。

本文分析了城市陪伴動物的日常故事敘事，發現其主導框架是一種「帶有複雜底色的喜劇」，對事物的具身經驗、感官身體的狀態以及相似的行動腳本構成了敘事的模式，而通過對敘事模式的反覆輸出和「自然化」，文本被確定下來，城市陪伴動物的一般形象被建構起來。而三個非常規條件下的「準則質詢類」的案例，則從關注話語與其特定歷史－社會條件之間的關係出發，發掘了通過「數位故事共創」的方式重建地方身分認同感的實踐，攝像頭的「如實記錄」與觀看者的參與組成了一種「正義見證」，重構了數位故事的客觀性，潛在的媒介「易見性」群體通過行動重組和補充了進行和平行動所需的線上注意力資源。

2022年4月疫情封控期間，一則2014年的新聞採訪被重新找出並廣為傳播。在這篇採訪中，時任復旦大學副校長的林尚立對上海的基層治理給出了「行政有效，治理無效」的判斷。林認為，治理是指「國家、政府、社會、民眾都能保持一種良好的關係，然後構建出一個共同生長的空間。治理一定要是兩維的，一維是政府，另一維是社會。如果只有政府管理，沒有社會參與，這種治理模式即便暫時有效，但也一定存在缺陷」（洪俊傑，2014）。他以上海居委會工作現狀為例，認為社區居委會本應是居民自治組織，現在成了政府的行政「末梢」。本應並存的兩套管理系統——政府行政系統與居民自治系統，不可避免同化成一套系統。如此看來，看似政府可以一管到底，行政確實有效，但造成的後果是基層社會的組織能力衰敗：一方面，基層始終無法形成較好的秩序和公共意識；另一方面，由於基層擁有的公共資源有限，居民個體存在的「私」的東西就會膨脹。

這則新聞給出了本文試圖想要討論和觸及的城市陪伴動物數位故事講述實踐的歷史－社會語境。陳映芳(2021)嘗試對上世紀70年代末，特別是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急劇變遷過程中的「政治－社會穩定」現象作出解釋，區別於宏觀經濟學和國家體制研究的分析路徑，作者通過「核心的社會體制」、「過渡期政治」、「社會轉型元框架」、「邊界

「後疫連接」中的城市陪伴動物數位故事講述實踐與社會交往變遷

狀態」等概念致力於「重新發現社會」——即在社會生活的細微之處發現社會的深層結構是如何影響整體社會運行的，以及政治經濟局勢的變動。從人文批判和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後疫連接」中的數位故事講述實踐同當時的時空、語境、條件、關係等進行著摩擦對話，它們在高壓強制的條件下建立起應激式的社會連接，引發了遙遠陌生的共鳴，重組並生發出有利於自身實踐的條件。這些實踐讓一些事實掙破了試圖隱藏和掩埋的牢籠，打開了隱蔽角落裏的視窗，讓一些私利和動機在討論中曝光，數位故事的講述和記錄本身就是態度。

已有的研究通常認為，表達性的數位元媒介行動會激發促進公民線下的公共參與和主體能动性 (Nah et al., 2022)，但是本文通過分析特定外部條件下的數位故事敘事實踐認為，這一結論需要一個高度語境化的前設條件。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比較視角，即當外部強制性壓力解除後，非常時期回歸常態，那些「突破實踐」所可能帶來的影響很難保留下來，但是「日常框架」卻得以延續。在隨後的一年時間裏，在疫情封控期間經由外部高壓和應激連接所重建的地方感（「並沒有很熟悉，現在電梯裏見到又不說話了」）、重構的正義性（「哪有時間看，轉了還要被封號」）、重組的關係方式（「也是沒有辦法，管好自己吧」）均難以為繼。「突破實踐」有助於我們理解在特定環境條件下（比如新冠疫情）社會階層、群體、個體面對種種社會問題時可能會給出的表達、態度與行動，探討城市體制的形成機制與解決城市問題的路徑（陳映芳，2022：201），但一種現代的公民精神漸由市民社會成長起來的過程，不能僅僅單靠某次應激式的觸發連接。如果缺乏制度性的保障與深思熟慮的道德觀念，創新式的連接行為還會回歸底層語法，其作為社會整體價值觀念醞釀與生成的動力機制在現實中作用還非常有限。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上海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 (2021年1月8日)。〈關於全面推進上海城市數字化轉型的意見公布〉。《上海發布》。上網日期：2023年8月15日，取自 <https://ghzyj.sh.gov.cn/gzdt/20210108/4dc5093a51e2462293a1a4ea104b1b71.html>。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7期(2024)

Shanghaishi guihua he ziran ziyuan ju (2021, January 8). Guanyu quanmian tuijin Shanghai chengshi shuzihua zhuanxing de yijian gongbu. *Shanghai fabu*. Retrieved August 15, 2023, from <https://ghzjy.sh.gov.cn/gzdt/20210108/4dc5093a51e2462293a1a4ea104b1b71.html>.

丹尼爾·里夫、斯蒂文·賴斯、弗雷德里克·G·菲克(2010)。《內容分析法——媒介信息化研究技巧(第二版)》(嵇美雲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原書Riffe, D., Lacy, S., & Fico, F. G. [2005]. *Analyzing media messages: Using 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in research*. [2nd ed.]. New York, NY: Routledge.)

Dannier Lifu, Sidiwen Laisi, Fuleidelike G Feike (2010). *Neirong fenxifa——Meijie xinxi lianghua yanjiu jiqiao (Di er ban)* (Ji Meiyun, Trans.). Beijing: Qinghua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Riffe, D., Lacy, S., & Fico, F. G. [2005]. *Analyzing media messages: Using 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in research*. [2nd ed.]. New York, NY: Routledge.)

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2022年6月1日)。〈致全市人民的感謝信〉。《解放日報》，第1版。

Zhonggong Shanghai shiwei, Shanghaishi Renminzhengfu (2022, June 1). Zhi quanshi renmin de ganxiexin. *Jiefang ribao*, 1.

吉奧喬·阿甘本(2018)。《普爾奇內拉或獻給孩童的嬉遊曲》(尉光吉譯)。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原書Agamben, G. [2015]. *Pulcinella ovvero divertimento per li ragazzi*. Milano: Nottetempo.)

Jiaoqiao Agamben (2018). *Puerqineila huo xiangei Haitong de xiyouqu* (Wei Guangji, Trans.). Chongqing: Xinan shifan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Agamben, G. [2015]. *Pulcinella ovvero divertimento per li ragazzi*. Milano: Nottetempo.)

有隻雪球(2022年3月4日)。〈#惠州防疫人員打死狗#貓狗不會傳播新冠病毒# #薩摩耶#〉(微博帖子)。取自新浪微博。<https://weibo.com/7726374405/Lic8UgQ8Q?pagetype=viewer>。

Youzhi xueqiu (2022, March 4). #Huizhou fangyi renyuan da si gou##Mao gou buhui chuanbo xinguan bingdu##samoye# [Weibo post]. Sina Weibo. <https://weibo.com/7726374405/Lic8UgQ8Q?pagetype=viewer>.

休·唐納森、威爾·金里卡(2022)。《動物社群：政治性的動物權利論》(王珀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原書Donaldson, S., & Kymlicka, W. [2011]. *Zoopolis: A political theory of animal rights*. Oxford,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後疫連接」中的城市陪伴動物數位故事講述實踐與社會交往變遷

- Xiu Tangnasen, Weier Jinlika (2022). *Dongwu shequn: Zhengzhixing de dongwu quanlilun* (Wang Po, Trans.).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Donaldson, S., & Kymlicka, W. [2011]. *Zoopolis: A political theory of animal rights*. Oxford,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李艷紅 (2016)。〈培育勞工立場的線上「抗爭性公共領域」——對一個關注勞工議題之新媒體的個案研究〉。《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6期，頁90–103。
- Li Yanhong (2016). Peiyu laogong lichang de xianshang “kangzhengxing gonggong lingyu”——Dui yige guanzhu laogong yiti zhi xinmeiti de gean yanjiu. *Wuhan daxue xuebao (renwen kexue ban)*, 6, 90–103。
- 洪俊傑 (2014年9月24日)。〈林尚立：上海基層治理有效嗎？〉。《上觀新聞》。上網日期：2023年12月10日，取自 <https://web.shobserver.com/wx/detail.do?id=63>。
- Hong Junjie (2014, September 24). Lin Shangli: Shanghai jiceng zhili youxiao ma? *Shangguan xinwen*. Retrieved December 10, 2023, from <https://web.shobserver.com/wx/detail.do?id=63>.
- 查爾斯·蒂利 (2020)。《為甚麼？社會生活中的理由》(李均鵬譯)。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原書 Tilly, C. [2006]. *Why?: What happens when people give reasons...and wh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haersi Dili (2020). Weishenme? Shehui shenghuo zhong de liyou (Li Junpeng,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wenhua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Tilly, C. [2006]. *Why?: What happens when people give reasons...and wh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陳思和 (2004)。〈文本細讀在當代的意義及其方法〉。《河北學刊》，第2期，頁109–116。
- Chen Sihe (2004). Wenben xidu zai dangdai de yiyi ji qi fangfa. *Hebei xuekan*, 2, 109–116.
- 陳映芳 (2021)。《秩序與混沌：轉型中國的「社會奇蹟」》。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 Chen Yingfang (2021). *Zhixu yu hundun: Zhuanxing Zhongguo de “shehui qiji.”* Taipei: Guoli Taiwan daxue chuban zhongxin.
- 陳映芳 (2022)。《從田野到理論：社會學札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Chen Yingfang (2022). *Cong tianye dao lilun: Shehuixue zhaji*.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7期(2024)

翁若婷(2016)。《蜜遊南境：以蜜蜂生態建構台南新都市地景》。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碩士論文。

Weng Ruoting (2016). *Mi you nanjing: Yi mifeng shengtai jiangou Tainan xin dushi dijing*. Guoli chenggong daxue jianzhuxi shuoshi lunwen.

黃盈盈(2018)。《性/別、身體與故事社會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Huang Yingying (2018). *Xing/bie, shenti yu gushi shehuixue*.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黃宗潔(2022)。《牠鄉何處？城市、動物與文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Huang Zongjie (2022). *Taxiang hechu? Chengshi, dongwu yu wenxue*. Nanjing: Nanjing daxue chubanshe.

潘霽(2023)。〈社區空間與線上連接：基層官微矩陣重塑人地關係的效果研究〉。《國際新聞界》，第3期，頁92-108。

Pan Ji (2023). *Shequ kongjian yu xianshang lianjie: Jiceng guanwei juzhen chongsu rendiguanxi de xiaoguo yanjiu*. *Guoji xinwenjie*, 3, 92-108.

薛存鑑(2015)。《台南市流浪犬捕捉、絕育、回置政策執行成效影響因素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論文。

Xue Cunyan (2015). *Tainanshi liulangquan buzhuo, jueyu, huizhi zhengce zhixing chengxiao yingxiang yinsu zhi yanjiu*. Guoli zhengzhi daxue gonggong xingzheng xuexi shuoshi lunwen.

謝靜(2016)。〈微信新聞：一個交往生成觀的分析〉。《新聞與傳播研究》，第4期，頁10-28、126。

Xie Jing (2016). *Weixin xinwen: Yige jiaowang shengchengguan de fenxi*. *Xinwen yu chuanbo yanjiu*, 4, 10-28, 126.

魏艷輝(2022)。〈字詞聯結式文本細讀方法應用示範〉。《文學教育》，第11期，頁85-87。

Wei Yanhui (2022). *Zici lianjieshi wenben xidu fangfa yingyong shifan*. *Wenxue Jiaoyu*, 11, 85-87.

羅伯特·斯科爾斯、詹姆斯·費倫、羅伯特·凱洛格(2015)。《敘事的本質》(于雷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原書 Scholes, R., Phelan, J., & Kellogg, R. [2006]. *The nature of narrative: Revised and expanded* [For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 revised and expanded].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Luobote Sikeersi, Zhanmusi Feilun, Luobote Kailuoge (2015). *Xushi de benzhi* (Yu Lei, Trans.). Nanjing: Nanjing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Scholes, R., Phelan, J., & Kellogg, R. [2006]. *The nature of narrative: Revised and*

「後疫連接」中的城市陪伴動物數位故事講述實踐與社會交往變遷

expanded [For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 revised and expanded].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Belair-Gagnon, V., Nelson, J. L., & Lewis, S. C. (2019). Audience engagement, reciprocity, and the pursuit of community connectedness in public media journalism. *Journalism Practice*, 13(5), 558–575.
- Chiliswa, Z. (2022). Citizens' everyday media practices and peace activism in ethnically polarised societies. *Journal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0(1), 79–108.
- Dahlgren, P. (2005). The Internet, public spheres,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Dispersion and deliber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2(2), 147–162.
- Ferree, M. M., Gamson, W. A., Gerhards, J., & Rucht, D. (2002). *Shaping abortion discourse: Democracy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ludernik, M. (2002). *Towards a "natural" narratology*. Routledge.
- Frosh, P. (2019). Eye, flesh, world: Three modes of digital witnessing. In K. Schankweiler, V. Straub, & T. Wendl (Eds.), *Image testimony: Witnessing in times of social media* (pp. 121–135). Routledge.
- Gemignani, M., & Hernández-Albújar, Y. (2022). Neoliberal and pandemic subjectivation processes: Clapping and singing as affective (re)actions during the Covid-19 home confinement. *Emotion, Space and Society*, 43, 100882.
- Haim, M., & Zamith, R. (2019). Open-source trading zones and boundary objects: Examining GitHub as a space for collaborating on "New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7(4), 80–91.
- Heck, E., & Tsai, M. (2022). Sharing therapeutic experiences of place: Co-creative digital storytelling as a way to explore connection to place. *Emotion, Space and Society*, 43, 100879.
- Herman, D. (2004). *Story logic: 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of narrativ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Hickman-Dunne, J., von Benzon, N., & Whittle, R. (2022). Facebook as a platform for collecting women's birth stories: Supporting emotional connections between researchers and participants. *Emotion, Space and Society*, 42, 100863.
- Hornik, J., Shaanan-Satchi, R., & Rachamim, M. (2019). The joy of pain: A gloating account of negative electronic word-of-mouth communication following an organizational setback. *Internet Research*, 29(1), 82–103.
- Kennedy, J., Meese, J., & van der Nagel, E. (2016). Regul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online. *Continuum*, 30(2), 146–157.
- Kim, J., Huh, J., Rath, B., Salecha, A., & Srivastava, J. (2022).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izen-eyewitness images and audience engagement with news. *Journalism Practice*, 16(8), 1774–1794.

《傳播與社會學刊》· (總) 第 67 期 (2024)

- Laurent-Simpson, A. (2021). *Just like family: How companion animals joined the household*.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Maddox, J. (2020). The secret life of pet Instagram accounts: Joy, resistance, and commodification in the Internet's cute economy. *New Media & Society*, 23(11), 3332–3348.
- Nah, S., Lee, S., & Liu, W. (2022). Community storytelling network, expressive digital media use, and civic engagemen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9(3), 327–352.
- Nee, R. C., & Santana, A. D. (2022). Podcasting the pandemic: Exploring storytelling formats and shifting journalistic norms in news podcasts related to the Coronavirus. *Journalism Practice*, 16(8), 1559–1577.
- Page, R. (2013). Seriality and storytelling in social media. *Storyworlds: A Journal of Narrative Studies*, 5, 31–54.
- Philo, C., & Wilbert, C. (2000). *Animal spaces, beastly places: New geographies of human-animal relations*. Routledge.
- Plummer, K. (2002). *Telling sexual stories: Power, change and social worlds*. Routledge.
- Plummer, K. (2016). A manifesto for social stories. In L. Stanley (Ed.), *Documents of life revisited: Narrative and biographical methodology for a 21st century critical humanism* (pp. 209–219). Routledge.
- Robbins, P. (2007). *Lawn people: How grasses, weeds, and chemicals make us who we are (Annotated edition)*.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Shah, D. V., Cho, J., Eveland Jr., W. P., & Kwak, N. (2005). Information and expression in a digital age: Modeling Internet effects on civic participa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2(5), 531–565.
- Sternberg, M. (2001). How narrativity makes a difference. *Narrative*, 9(2), 115–122.
- van Krieken, K., & Sanders, J. (2021). What is narrative journalism?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an empirical agenda. *Journalism*, 22(6), 1393–1412.
- van Patter, L. E., & Hovorka, A. J. (2018). “Of place” or “of people”: Exploring the animal spaces and beastly places of feral cats in southern Ontario.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19(2), 275–295.
- Whatmore, S., & Thorne, L. (1998). Wild(er)ness: Reconfiguring the geographies of wildlife.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3(4), 435–454.
- Yin, D., Gao, Q., Zhu, H., & Li, J. (2020). Public perception of urban companion animals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in China. *Health & Place*, 65, 102399.

本文引用格式

方師師 (2024) 。〈「後疫連接」中的城市陪伴動物數位故事講述實踐與社會交往變遷〉。《傳播與社會學刊》，第 67 期，頁 63–90 。